

歐拉的學伴

威伊，我的父親

作者：席爾薇·威伊（Sylvie Weil） 譯者：趙學信

作者簡介 席爾薇·威伊曾在巴納德學院、本寧頓學院和亨特學院以及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任教法國文學。



席爾薇·威伊。

自我父親1998年8月6日去世，至今已將近二十年，然而他有時仍召喚我：「席爾薇，帶我離開這兒，我好無聊。」（他所用的法文沒這麼有禮貌。）



圖1：風流倜儻的安德烈·威伊1930年。

我相信按照猶太傳統，安德烈（André）已被永久指派研究學伴（study companion）。以前我曾問他誰會是這位學伴，他微笑答道：「歐拉。」所以當他找我，說他無聊時，我問：「那麼歐拉呢？他是否也覺得無聊？」

對我父親而言，無聊和浪費時間是最可怕的事。時間必須花得有用，或是快樂運用。我仍留著在我十幾歲時，父親寄給我的信。他建議了非常獨特的

學習計畫：每晚

讀古希臘的歐里庇得斯（Euripide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週四造訪羅浮宮或法蘭西喜劇院（Comédie Française），週日下午去普萊耶音樂廳（Salle Pleyel）聆聽貝多芬。……這些太過理想化的信件令我微笑，但也再度觸發我的愧疚感，因為在15歲時，我只想過得快樂。

和安德烈共餐可能會有些壓力：我們會談些「有趣」的主題。背誦萊辛（Jean Racine, 1639~1699）的詩篇可得到嘉許，若是背誦維吉爾（Virgil）則更佳。但要不遭受批評則很難，安德烈的反應可能是：「我可憐的女孩啊，難道他們沒教你拉丁詩歌的正確語調嗎？」但他的課表並不全是嚴苛的，他喜歡薩雅吉·雷（Satyajit Ray, 1921~1992）和黑澤明（Akira Kurosawa, 1910~1998）的電影，他喜歡游泳、滑冰。……他也可以很戲劇性。當我妹妹和我年幼時，他讀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的喜劇給我們聽，他扮演起天真少女很拿手，他的假聲讓我倆樂壞了。

父親不僅是世界頂尖的數學家，他傲慢、嘲諷和咄咄逼人的態度也是眾所周知的，我常覺得，能和這樣的父親長大是一種榮幸。他的強勢讓博士後害怕到會在見他之前，先派我帶著家庭作業進他的研究室，以試探大師當下的心情。如果聽到他對我大吼大叫，他們會立即逃之夭夭！

正因為安德烈以傲慢聞名，使得我的一樁童年回憶特別甜蜜：在美國西部某地一家破爛的汽車旅館裡，傲慢、令人生畏的數學家安德烈·威伊，睡衣



圖2：戲劇性的安德烈正主持會議，穿白襯衫、坐在地上的是塞爾日·郎（Serge Lang）。芝加哥，1950年代。

外面披著件雨衣，冒著雨在光線陰暗的旅館中庭裡，逐間敲著門，焦急的乞討二角五分美元銅板。在一個擺著兩張吱吱作響床鋪的糟糕房間裡，母親、妹妹和我正用投幣式電視看電影，但我們把硬幣用完了。安德烈沒討到銅板，所以我們永遠不知道即將失聰的年輕美麗女主角後來怎麼了。

2008年，當西蒙娜·威伊（Simone Weil）的百年誕辰接近時，顯然有大量關於她的書籍即將出版。長久以來我一直扮演著「聖女的姪女」的可疑角色，我有點像是所謂的「宗教聖物」，因為毫不相識的人會自然而然走過來，碰碰我，甚至親吻我，同時驚歎道：「哇，你多像她啊！」現在是時候來寫一本只有我能寫的書了。

西蒙娜的名氣當然遠比安德烈更大。能讀懂（或自認能讀懂）哲學、政治學或神祕主義著作的人，多過能讀懂數學的。更何況在許多人眼中，她是聖女！但如果不寫安德烈似乎並不公平。這是平衡的問題，尤其因為我總是把安德烈和西蒙娜當成一對奇特的雙胞胎（圖3）。

我的姑姑不只是聖女，而且是我父親的分身，他倆長得像是雙胞胎。這對我而言很糟，因為我和她

長得很像。我居然很像我父親的分身。^①

這種相像當然影響了我們的關係。安德烈覺得他們過於溺愛的母親太保護西蒙娜，所以他鼓勵我獨立。例如當我12歲時，有次我必須穿越整個法國去和親戚度假，行程中需要換三次火車。安德烈寫信給三個車站的站長，請求他們接見並協助我。到每一站時，我都努力避免被站長發現，自己換車。當我回到家，把事情告訴父親時，他非常高興。他說：「我盡了做父親的義務，你也盡了做女兒的義務。」



圖3：一對奇特的「雙胞胎」，安德烈和西蒙娜，1922年。

① Sylvie Weil, "Ches les Weil: André et Simone" (2009) Buchet/Chastel, Benjamin Ivry 英譯 "At Home with André and Simone Weil" (2010)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我在書中想寫的不是一部傳記，而是重新捕捉和建構一個「威伊空間」。容我再次引述書中的一段，出自〈歐幾里得之美〉這一章：

我在西蒙娜的筆記中讀到：

「現代數學家的公設系統。他們在追尋什麼？他們研究數學卻不知道拿它何用。（問安德烈：當他成功時，他感到的是歡喜，或是美學的喜悅？）」

我讀到這句時……不知為何突然心情大好。放在括號中的是一場小小的家庭團聚，而且是我的家。……

我想像著在家中廚房的午餐，我祖母特製的德國酸菜、一瓶白葡萄酒，還有西蒙娜和安德烈之間的對話。安德烈是否會像他有時告訴我的那樣，跟他妹妹說：數學不是科學，而是藝術？他是否會像後來給我的信中所云，也告訴西蒙娜：感受到思路

泉湧、彼此銜接源源不絕的快感，遠勝過性快感，因為前者能維持數小時，甚至數天之久？

在一張1938年布巴基（Bourbaki）會議的照片（圖4）可以看見，我父親神采飛揚，誇張的搖著鈴。西蒙娜也在場，非常認真的伏首寫著筆記。這張照片是早在我出生之前拍的，但照片中的人都是我童年時常常見到的。布巴基小組^②充滿熱情、理想性，而且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無私的，他們把著作署名為「尼古拉·布巴基，南加哥大學」（Nicolas Bourbaki, Université de Nancago，南加哥是由南錫、芝加哥〔Nancy-Chicago〕組合而成）。

但是布巴基小組卻習慣高聲表達這種無私和充滿理想的熱情！他們有次在阿爾卑斯的一家小旅館裡

^② 見“the review of Bourbaki, A Secret Society of Mathematicians in the October 2007” Notices: <http://www.ams.org/notices/200709/tx070901150p.pdf>。



圖4：安德烈在某次布巴基會議上搖著鈴，1938年。在他右邊認真低頭寫筆記的是西蒙娜。在他左手邊是迪奧東涅（Jean Dieudonné）、厄瑞斯曼（Charles Ehresmann）和德沙特（Jean Delsarte）。照片前方、背對鏡頭的可能是卡當（Henri Cartan）。

開會，這群紳士彼此間的爭吵太過激烈，使得旅館主人找來警察，以免發生凶案。我還必須說，安德烈最初鍾情的似乎不是數學，而是槌球（croquet）。槌球後來讓位給、或者可能引起他對幾何的熱情。我的祖母塞爾瑪（Selma）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幽默但驕傲的宣告他的這項轉變。安德烈當時年僅七歲。

我得說，安德烈強烈的個性使得他很任性，尤其是對傳統禮節不耐煩。有次在普林斯頓的一場音樂會，其間發生騷動，坐在安德烈前面的某人被用擔架擡了出去。音樂會繼續，但仍有人輕聲低語。父親生氣的要求他們安靜。一位女士噓聲斥責他：「你知道，有人過世了！」——「那又怎樣！」安德烈回答：「還有什麼事能好過聽著莫札特而死去！」這正是他的心願：能聽著莫札特辭世。很遺憾我沒能讓他如願。

在快樂的1938布巴基會議之後，隔年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父親1939年11月在芬蘭赫爾辛基被捕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根據奈瓦林納（Rolf Nevanlinna, 1895~1980）的描述，他解救了被當成俄國間諜、即將被處決的安德烈。在輾轉移地瑞典、丹麥和英國的監獄後回到法國，他因為逃避徵兵的罪嫌而被關押。

當我為寫書蒐集資料時，我在一盒文件裡發現一張紙，我立即稱它為「家庭照」。四個短句，四種筆跡，一切對我都熟悉得仿如親睹其人。紙上第五人的筆跡是大而潦草的深藍色鋸齒線，無疑是典獄長。1940年2月，安德烈被關在盧昂（Rouen）監獄，家人前往探訪，卻被值班警衛擋住，不准探視。我可以想像祖母塞爾瑪會適時出現逼真的急症發作。警衛被說服，願意替他們傳一封信。一家四人走進咖啡店——監獄的街對面必定會有咖啡店——每個人寫了一句話。前三句是藍色的：塞爾瑪、西蒙娜，以及我母親伊芙琳（Eveline）。用的或許是我母親的筆。我祖父則絕不用藍色墨水，他或許向咖啡店借了筆，他的字跡是黑色的。



圖5：法國陸軍時期的安德烈。（攝於1940年）

團體照是會說謊的，因為每個人都努力擺出快樂、微笑的表情，真正的情感被偽裝起來。但這四個句子沒有偽裝！每句都只用簡短數語，呈現出每個人的真實性格，以及他們和安德烈的情感關係。塞爾瑪和伊芙琳競相表達愛意，西蒙娜希望她哥哥能寫詩，並且想出美麗的定理。伯納德（Bernard）的情緒比較內斂，只說希望很快能和安德烈見面。從這一張紙，我能重構出整個威伊家的場景，猶如我就在現場。

事情如何收場？數個月後，安德烈受審，回軍隊服役（圖5），然後撤退到英國。

1994年時，父親榮獲京都獎（Kyoto Prize），我陪他到日本領獎。對我而言，日本是一個神祕之地，它是我和妹妹年幼時，安德烈對我們描述的想像國度。1955年，父親去日本待了一陣子，回來後就對日本十分著迷。他教我們鞠躬，拿筷子，用很小的浴巾。當電話鈴響時，我們會急忙拿起話筒回答：*Mush'mashi!* 安德烈解釋：「在日本，人們從不展現情感，那是不禮貌的。你必須時時微笑。」我們練習有禮的舉止，咯咯笑時用手掩口。我們是日本人。

現在我和父親到了京都。頭兩個晚上，我們離開他憎惡的豪華飯店，到飯店女服務生推薦的一家樸素餐廳吃晚飯。當我們慢慢走在一條陰暗的小街，安德烈解釋或評論一些我們看到的事物時，我感覺像是又回到童年想像中的日本。

安德烈很高興能見到黑澤明。他對這位大導演說：「我有一點遠勝過你。我能喜愛和欣賞你的作品，而你卻無法喜愛或欣賞我的。」有人認為這是明褒暗貶，但他們誤會了，安德烈完全是真誠的。

在東京的最後一個上午，當我們等候搭計程車去皇居時，沉默帶來壓迫感，於是安德烈開始覺得無聊。他轉身問黑澤明：「天皇喜歡你的電影嗎？」一陣短暫的沉默後，黑澤明微微鞠躬並回答：「今上是一位偉大的君主。」

在京都有著數不盡的儀式需要「履行」，但安德烈年事已高，他不想照規定做，也不想鞠躬；他再也不想當日本人了。他的事由我打理，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像是文樂的傀儡師，而他是我的人偶！有幾次我會希望能為我那既不願微笑、又不想有禮的年老父親找張美麗的日本面具，甚至找張金紅雙色的惡鬼面具。

然而最終他並不需要面具。我看著三位京都獎得主的官方照片（圖6）。黑澤明略顯興味、帶有距離感的淺笑，高大富態的美國科學家勞特伯（Paul Lauterbur）則是咧嘴而笑。至於安德烈，這位夾在兩個巨人中間的老侏儒，則是笑到最後的人。他把手從合握的一堆手裡抽開，他的手堅定有力。他自由了！

本文出處

本文出自 *Notices of the AMS*, Volume 65, Number 1, p.54-57。本刊感謝作者 Sylvie Weil 同意翻譯，以及授權圖1到圖5照片刊登。同時也感謝 AMS 同意翻譯刊登，以及稻盛財團（Inamori Foundation）授權刊登圖6的照片。

譯者簡介

趙學信，網路工程師，兼事翻譯寫作。

延伸閱讀

- 安德烈·威伊的回憶錄《數學家的學徒生涯》（*The Apprenticeship of a Mathematician*）（1992）Birkhäuser。
- 席爾薇·威伊《與安德烈和西蒙娜在家中》（*At Home with André and Simone Weil*）（1992）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伯瑞爾（Armand Borel）〈與布巴基的25年，1849-1973〉
<https://www.ams.org/notices/199803/borel.pdf>
這篇文章記錄了作者由與布巴基成員非正式的交流到成為布巴基一員的個人回憶紀錄。



圖6：1994年京都獎的三位得主：勞特伯、威伊、黑澤明。